朱开宇著《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

——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评介

魏君州

(中国台湾 南投县 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

本书的作者朱开宇，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硕士论文修改而成。本文尝试以长时段的视野，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探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化的原因，以及该地区宗族制度强固闻名的症结，并藉此作为了解中国近世社会宗族发展的一个参考指标。以下便就书中各章一一加以介绍。

第一章为绪论：问题的提出。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了概略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维。作者尝试论证，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与“流动”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由南宋之际的“高社会流动”到明中叶的“高流动不安社会”，显示出宗族制度的发展与人们心中的不安全感有深刻关联。同时，由南宋到明中晚期，徽州宗族制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背景，也有所转变。

第二章为南宋至明中叶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徽州由于境内多山，地狭人稠，迫使徽人不得不以贾代耕，外出经商。故徽州的商业兴盛自古闻名，早在宋代，徽州的农业经济即带有高度的商业性质，至明代中叶更有著名的新安商人的出现。而朝廷的重税与徽州农业生产的贫瘠也对当地的经济、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层面造成深远的影响。^①

由于徽州的人地比例悬殊，使徽州的区域经济不太可能依靠农业生存，尤其是当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可能使徽州原有的商业与经济作物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宋汉理便曾推论，十二世纪时的徽州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使许多陷入贫困的良民被迫接受大族的保护或成为其附属。^②作者对于宋汉理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确实南宋对徽州强固的宗族制度起着关键的“萌生”作用，经济因素也确实对宗族制度有强化效果。但宋汉理所论南宋徽州人地比例悬殊、税额最重、贫富两极分化，这些现象严格说来似乎应是明中晚期徽州商帮崛起后的写照，宋汉理似乎有过度强调之嫌。^③

南宋时徽州文风的昌盛与科举进士的众多，正与商业化农业造成的财富并与江、浙等商业、文化精华区的密切联系有所关联。徽州界处万山中，山民朴拙尚武勇，随着唐末以降中原土族因避乱而纷纷迁入，风俗由质趋文，自宋代起，由于文化的发展与渐兴的学风，终致产生了一批主要经由科举而入仕的名臣，而随着文化的提升与功名的成就，许多当地的名族也在这个时间诞生。

^① 作者指出，徽州的高赋税政策源于五代，宋、元时期徽州仍是赋税偏高的地区。一般而言，宋代徽人均将徽州的重税摊派归咎于五代时杨行密对徽州的掠夺。作者并引述了斯波义信的观点，商业化恰恰是藉此高税政策而得到发展，徽州在宋代末年以前山村产业与商业性的农业因此迈入大幅的开发，并使徽州与江苏平原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可参见斯波义信，《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收入刘焱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页4-5。

^② 见宋汉理着，叶显恩译，《〈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页68。

^③ 作者认为，就徽州宗谱所见，巨商富贾益形增多并在宗族间扮演重要角色，显而易见是在明中叶徽州商帮兴起后的事。这实与明中叶高度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下，社会资源的高度饱和与竞夺，明政府对地方毫无节制的重税榨取，徽商巨商于淮扬盐业的成功与垄断，才更进一步促成并巩固社会悬殊两极分化。因此，自南宋起徽州萌生的宗法制度与佃仆制相信要到明中叶才得以确立与巩固。

徽州由文教渐萌至号称东南邹鲁的学术史回顾，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徽州的文教昌盛是自宋室南迁后，而朱熹的学术在徽州有深厚的影响与传统。二是，部分学者士绅的提倡学风，设立义塾，藉由师友渊源，一时科考中举颇盛，文风益炽。

据宋汉理统计，徽州在北宋产生了 188 名进士，南宋时期则暴增为 432 名，她并得出进士名额在某一时期相对地集中于某些宗族（或家族）的结论。可以说，徽州的仕宦名族主要诞生于南宋时期。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唐代中原衣冠之家大量迁徽，助长了徽州文雅之风，而北宋末与南宋初当地士绅文人与地方官员的提倡，是此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与宋朝整个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南迁有密切关联，徽州地近南宋首都临安，又有水路可交通，更进一步的受到江、浙精华区的文风感染，似乎更为关键。

作者并对几个生产众多进士的个别家族进行考察，如休宁程氏、会里程大昌与汉口程瑛等族。在南宋之际，其中以会里与汉口两族的功名仕宦造成的显赫家势，最为人瞩目。他们除了以进士功名与荫补为官，造成家门显赫外，官宦仕途似也对家族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如会里程氏一族后来日趋没落，应与该家族中程大昌一支整支迁居湖州有密切关系，因该支的迁居对程氏家族的凝聚与资源整合产生影响，故分散了家族的力量。

南宋与元代，是理学在徽州逐渐散布渗透的时期，由南宋时期发轫，至元代时理学在新安相当盛行，因此徽州博得有“东南邹鲁”的美誉。而这段时期，徽州的理学有很强的程朱倾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派。徽州理学与书院的真正勃兴，始于朱熹两次回归婺源省墓并讲学乡里之后。

南宋时期对徽州许多宗族的发展具有转折的关键。此时，这些有声望的家族开始发展家族组织，同时一批具有理学理念的地方学者也参与提倡，科举（功名仕宦）、名族、理学、家族组织交织在南宋以降徽州的地域社会中，互相渗透形塑。当时部份有声望的仕宦家族展开祠庙活动，藉此提高家族的身分地位，部分成员或理学家也开始展开寻根溯源与宗谱修撰的活动。^①

在宋元易代之际，若干地方望族选择与元朝合作，以保障乡里、安定地域秩序，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家族成员进入宦途，以维系家族发展。元代新安的社会发展有两个值得观察的现象，一为这些自南宋起拥有声誉的仕宦家族或其成员，如何作他们人生或家族发展的选择。二是新安学术上的主流理学，恰也是在元代大放异彩，许多著名的学者与精英投入其中，似乎也显示了政统断绝下，寄托心志的学者用心于程朱理学的阐述上。^②而元代科举的复行与士绅家族的投入，也显示出科举所带来的名声与地位，仍是此时徽州家族所追求的价值。

元末的红巾贼之乱，对徽州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可说是自宋代以来，除方腊之乱外，对徽州造成最惨烈破坏的一次战祸。由于元明鼎革之际的战乱，耕地不足的现象获得了纾解。直到十五世纪，户口才有缓慢的增加，从而出现了人口的稳定发展。朱元璋的农业政策，确实迅速复兴农村经济、安定农民生活。

南宋时地方望族对基层科考的影响力日增，但基层科考仍能保持公平性，然而至明中叶以后，地方势族似乎已有操纵地方科考的能力。金钱对于功名身分的取得，发挥日益深刻地

^① 如徽州程氏对于世系传承的追求及修谱之重视，自宋初始启，南宋时期渐兴，历元至明此一风气愈盛。正因新安程氏诸宗支对修谱的重视，方才奠定明中叶程敏政大会新安一带程氏诸宗支，并完成编撰《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可以说，程祁总谱使休宁乃至新安程氏诸宗支间彼此认同具体化。

^② 作者指出，元代徽州朱学的抬头，重要原因自与徽人对朱子的崇拜，与南宋时期朱学就已逐渐在徽州传布渗透有关。而几位徽州重要学者努力不懈地撰述与收受子弟传承，更具关键。但科举停废与异族入侵也与当时士人心灵转变与学术风格转向有关。理学兴盛后，其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对家族人伦、社会风俗影响深远，渗透着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家族伦理。可以说，徽人们所信奉统合宗族的尊祖敬宗之“理”，正因其上承于天，下本乎人之天性，所以此“礼法”方有其普世的意义。

渗透力。十五、十六世纪是明中叶商品经济开展与中国社会性质再次转型之际，也是徽商跃上舞台之时，徽州社会此时正逢剧变，传统价值观产生动摇，出现了“弃儒就贾”的社会风潮。这种现象与明中叶大量的人口增长和科举名额的限制有关，显示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与益形困难。徽州在出现“弃儒就贾”社会现象的同时，更有儒贾双向或先贾后儒的发展策略，迭相为用，能守能进，以求家族的永续发展。

第三章是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宋明间的休宁程氏为个案的探讨。作者尝试对贺杰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响应，^①来探讨徽州的家族集团与地方士绅如何维系着他们的身分地位与名望，并期使自己所隶的家族能在中国近世社会的高流动性中，减缓其被冲击的节奏。作者欲藉由观察休宁程氏五个宗支，南宋至明代的长时段发展，来说明这些大族拥有声名，并能较长久发展的原因。

作者认为，在近世社会中，经营地方、宗族组织与多元发展，而使宗族有较高的伸缩性，才是宗族维持发展的关键。作者的思维是，一方面科举确是影响近世中国诸多大族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从南宋开始，随着科举成功的日益困难与地方势力得以发展的契机，多元发展与经营地方乃愈形重要，甚至逐渐有可能成为先于科举成功的要素。由休宁程氏家族诸支长期的发展来看，仕宦显达似乎不足以作为家族兴盛的唯一凭借，家族的内聚力、家族领导人的成功运作，以及对地方的用心经营，似乎更是家族能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

作者对于休宁程氏五个宗支的发展进行比较，尤其着重于程氏发展了一套包括族祭、修谱和定期会盟等“敬宗收族”的家族组织，使家族内外谐和、家门雍睦，藉以增进家族的凝聚力，有利于维系家族。作者发现，尽管休宁程氏诸宗支都有经营家族组织的意图，但由于立基点的不同，南宋时显盛一时的会里与汉口两族，因其高层仕宦的性质，对地缘与家族组织的经营反不若率口程氏，也导致明中叶时家族声势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由此而论，家族组织的发展与家族领导层对家族的经营强弱，对家族长期的发展更有决定性影响。

另外，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近世中国家族组织的发展，最初可能只是从宗族情感考虑，而不涉及现实因素。但随着科举社会下家族兴衰发展的不稳定性日增，家族组织的发展是否逐渐与现实考虑相结合，成为家族内士人领导阶层藉以维持家族持续发展的凭借，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作者指出近世中国家族的发展取决于地方性，地方基础经营得愈深厚，家族内聚力凝聚得愈强，将愈能使家族内在与外在的伸缩性增强，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使家族持续发展。以宋代以降科举社会之纵向流动与地域移动而言，虽然科举成功固然是势家成立的重要因素，但单靠科举很难维持家族的常盛不衰。因此，家族组织、家族的团结互助，以及经营地方，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作者本章以宋明间的休宁程氏发展，来讨论徽州甚至整个近世中国的宗族发展与社会流动性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的看法。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作者对于休宁程氏家族的解释是否能适用于整个近世中国的家族发展呢？休宁程氏的个案究竟是特殊性抑或是普遍性的现象呢？作者虽未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但显然认为这是个代表性的个案，故以此来进一步推

^① 贺杰曾指出：“在中华帝国晚期，社会运动性较高的一个直接反映，就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家族集团能够连续地使其成员上升为上层士绅。”然而，徽州大族却有很强的稳固性，许多宗族甚至数百年间都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故贺杰又提出：“这里所提到的家族集团（指《新安名族志》所载名族中出过进士的21个家族集团），他们是否可以长期维系其尊崇的社会地位？而其社会地位，是否会因为其它家族集团的崛起而相应下降？或者说，这些家族集团是否具有连续培养和造就进士的能力，以便输送本族的进士侧（应作厕）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从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藉这些进士以维系其家族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呢？”可参见贺杰，《明清徽州的宗族与社会流动性》，收入刘焱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页76-95。

论近世中国的宗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宋汉理曾对两宋徽州各县的进士做过统计，其表如下：^①

县名	婺源	休宁	歙县	黟县	祁门	绩溪	不明 县份
北宋	58	13	27	37	19	15	19
南宋	130	138	55	39	37	11	22
总计	188	151	82	76	56	26	41
成长 倍率	2.24 倍	10.61 倍	2.04 倍	1.05 倍	1.95 倍	0.73 倍	1.16 倍

由表中可知，婺源和休宁是两宋时徽州出进士最多的二个县，而休宁的进士更从北宋时的 13 名，暴增为南宋时的 138 名，增加了十倍之多，这是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宋汉理并得出进士名额在某一时期相对地集中于某些宗族的结论。其中休宁的程姓进士，北宋有 2 人，南宋有 15 人。宋汉理认为，教育是建立和保持这些大族官户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

笔者分析，由表中来看，徽州各县除了休宁县在南宋时进士名额的成长倍率有大幅增加外，其余各县并未有如此显著的变化，显示出休宁县的发展仍有其特殊性。其中原因除了作者在第二章提到的文风感染与重心南迁等因素外，极可能还有宗族发展的因素。究竟休宁县何以在南宋时进士人数增加了十倍之多？这是否与其宗族的发展策略有所关联？可惜作者在论述休宁程氏时并未深论此问题，或许可以尝试从这个面向来重新思考，以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第四章是明中晚期徽州地域社会的剧烈变动。明中叶的徽州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出了一批雄视一方的徽商，其中缘由除了徽州人善于做生意与拜开中折色制之赐外，更为深层的因素是徽州地瘠人稠，实是一个缺乏耕地与资源的穷困地区，“以贾代耕”是他们突破困境寻求生路的途径。而明中晚期徽州宗法制与佃仆制等的重新强化确立，实与徽州困乏的地理生态与当时商业发展下徽州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态，密不可分。

明中叶的徽州，伴随着流动的商业社会而来的是风气的剧烈转变，使原本风俗淳厚的「东南邹鲁」理学名郡已成为利欲横流互相兼并的鬼域。这种崇尚利欲奢靡“拜金主义”式的社会风气，更冲击了徽州原本风俗淳厚的宗族伦理与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自正德末嘉靖初开始，徽州已趋于贫富两极分化。由于歙县与休宁是徽州六邑中行贾风气最盛的地区，这种贫富分化也最显著。

此外，由于徽商巨贾在外的富名，产生徽州因富名而受实祸的现象，徽州因此成为明王朝重税盘剥的对象，并引起贼寇觊觎。国家繁苛的税赋与悬殊的贫富分化及因此所形成贫困流移的无赖阶层，隐然成为徽州动乱的祸源。自成化、弘治开端加重的税额，至嘉靖年间益形繁苛，使许多百姓不堪承受，终在万历时发生「丝绢之哄」。而寇乱问题更是在正德年间就已严重波及困扰徽州，嘉靖时遂展开筑城运动。流寇之祸更有境内无赖与之相互勾引，这实与当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对立与纲纪丧失有莫大关联。饥荒与粮食不足的危机，也成为嘉靖中叶以后徽州的常态与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藏于徽州兴盛经商风气背后的隐忧。由作者在本章中的讨论，可看出明中叶以后徽州的变动情形，著名徽商的出现，对徽州产生了许

^① 见宋汉理著，叶显恩译，《〈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 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页 70。笔者并根据其统计数据，增列了南宋进士的成长倍率一栏。

多极为深层的影响，

第五章是地域失序下的社会整合。嘉靖晚期至隆庆、万历初年，正是国家权力层次由尝试、摸索重新整合社会机制到确实调控地方社会的演变过程。在明中叶徽州赋烦役重失序焦躁的社会氛围下，许多徽州文人都强调循吏的难为与对百姓的重要，可由当时民间的鄙语称呼守令为「大父母」看出。推广乡约成了守令执简驭繁的有效手段，欲藉乡约「思整俗之不齐」。振纪纲、励人伦显然是乡约的主要精神目的，除了劝善的教化作用外，并可藉由地方长老的月旦人物来施与惩戒。纾解民困、施善教化、执简驭繁与宽严并济是善治徽郡的循吏法则。

随着里甲制在明中晚期趋于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官府在讼牒频仍下公权力更为直接地介入，以维持基层社会的秩序与满足基层民众解决纠纷的需求。到嘉靖与万历初年，这种地方官事必躬亲地介入讼狱的审理，尽其所能排除胥吏与势豪因缘为奸的弊端，成为常见的事。^①自嘉靖中晚期徽州多事之秋，横受重赋税摊派正开始，亦即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挑战之际，国家权力的有效介入成为常态，而部使者与侍御史的角色重要性大幅提高，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并将中央的政治控制进一步渗透。作者此处似乎颇为肯定国家权力的介入，以整合社会秩序，然而对其弊端却未涉及，应值得作进一步的阐述。

当时面对失序的徽州士绅似乎进行着一场「文化复兴运动」，推展「心灵净化」以移风易俗是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乡里与宗族成了他们淑世教化的场域。以标榜典范为主体精神，以宗祠、宗谱与《名族志》等为内容主体的「文化复兴运动」，关注着地域社会内风俗的改善与秩序的维持。在明中晚期兴起的撰谱、兴建宗祠的一股风气，除与商业兴盛因素相关外，也可视为在当时浮躁脱序的社会风气下，各民族欲藉这一类宗族组织来教化、约束族众。理学的精神成为当时怀抱士大夫精神的儒士试图重整社会秩序的凭借，程朱理学所重视的对乡党宗族等小区的关怀与教化，成了他们所努力的方向，宗祠的兴建、谱牒乃至合一郡之谱的名族志的编撰均蕴含着礼教的深意，包含着化民成俗、转变风尚的期待与实践。

第六章是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及其宗谱之〈社会记〉析论。作者以吴子玉编撰的《休宁茗洲吴氏家记》中的年表〈社会记〉为文本，来探讨吴氏宗族发展的时代性意义。〈社会记〉的记载起自明英宗正统 12 年（1447），终于万历 12 年（1584），时间横跨 138 年，这正是明代告别承平迈入不安纷乱的一段时间。由于茗洲村是一个典型边鄙贫瘠的山区，较僻野寡闻，因此将〈社会记〉中的内容视为各类信息的传布与接收，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意义。由其接收外地讯息的内容，充分显示这个原本环山僻野的地域，因为商业活动繁盛而与外界高度密切相关，呈现了地域此时如何高度地受外界波及，「流动」成为描述地域性质的最佳写照。

由此使我们得以了解吴氏宗族统合的背景，流动不安中的对立造成联合同宗力量的必要性，也由于冲突造成宗族意识的强化。由茗洲吴氏的例子可看出，明中叶此一家族如何运用商业、仕宦与经营地方相互支持的发展策略，而跻身名族，这应是一个宗族于此社会变迁之际的真实写照。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为本章论述的两个主轴，两者间互相关联，秩序的松动与重建都渗透着宗族日常生活与发展。

第七章为晚明的流寇世界：动荡不安中村落宗族之社会组织的强化兼论徽州社会经济发展的症结。明末的徽州正面临着地域秩序崩解之际的极度不安。明末徽州的动荡不安，正肇

^① 作者在此以嘉靖、隆庆时，休宁县的知县王谣、张试为例，指出他们试图阻绝胥吏（背后又常有势豪勾结）为弊，似乎颇有成效（191-192 页）。然而，作者在此依据的史料多为吴子玉的赠序，可能会有溢美的成分。况且，若知县与胥吏、势豪处于对立面，其施政必然面临严重的阻碍，故他们努力的成效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仍然需要再做慎重的评估。

因于“人满土隘，全仰给于四方”的高度依赖性上，在商业与粮食上高度与外界依存的徽州，在通路被断绝后遭遇了极大的困境并导致地域失序。尤其，在金声主导的“黔兵案”中，正可看出当时地方处于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徽州百姓所接收“流动传布”的惊恐讯息使他们感到岌岌可危，终将欲临时改道借境转剿流寇却素质低落的黔兵歼灭于边境。

由“黔兵案”中实可看出兵荒马乱下，凤阳总督马士英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与士绅金声为主的“地域统合”间，彼此间的严重的冲突与协调统合机制脱钩；且在地域严重失序下，由金声主导的社会统合，在大环境下真可谓名符其实的“杯水车薪”。这显示了在当时大环境下，上层士绅社会统合的努力，终于抵不过下层“社会结构”的制约。

社会经济命脉过度依存外在环境的徽州，在明末社会氛围极度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下，失去了外援与谋求生存的凭借，并由此而更突显了其内在特殊的社会症结，高度的失业率与庞大的无赖阶层所造成社会治安的动荡与隐患，成为士绅官宦心中所忧的流寇向导。这又再一次突显了徽州聚族而居，以保守著称闻名的村落宗族力量，于此高度不安之际，更为强化地凝固，且成为官员与士绅仰赖以应付变乱、稳定秩序的凭借。

但固然以社会基层实体的村落宗族为单位的乡勇获得凝聚强化与统合，然而自明中叶以来的士绅官员推展乡约的教化目的，期望改善风俗并恢复有如明前期般的醇美单纯的秩序，则显然归于失败。似乎由社会上层结构的教化活动与文化复兴，仍抵不过社会下层结构中属于经济层面的内在症结。

由本章的论述可知，以徽商闻名且在经济上有高度依赖性的徽州，在明末流寇横行的动荡之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种社会背景也促使宗族力量更为强化。为了因应动乱的大环境，金声遂团练义勇，规划乡里公约来保障境内的安全，取得一定的成效。由士绅恐慌当地的无赖奸民与流寇勾结犯境可看出，当地贫富差距的尖锐矛盾。然而，徽州除了无赖充斥之外，是否有大量土寇的产生？作者并未提及。另外，下层绅士在明末的徽州社会中，扮演了何种角色？^①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综观本书后，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用长时段的视野，来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理学的传布，对徽州的宗族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藉由这个角度，也可使我们较清楚的看出，徽州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

第二，研究面向广泛。作者以徽州贫瘠的生态环境、商业的兴盛、宋元时文风的昌盛、理学渗透的根深蒂固，与明中叶显著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浮动不安…等各种角度，来作为讨论徽州强固宗族制度的不同面向，由此来理解徽州宗族制度形成的各种因素与时代背景。

第三，藉由对个别宗族的具体研究，试图了解近世中国的宗族发展问题，发挥以小见大的功效。如作者从休宁程氏的个案分析中发现，在中国近世社会中，经营地方、宗族组织与多元发展，才是宗族维持发展的关键，甚至有可能成为先于科举成功的要素。这个观察宗族发展策略的论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总之，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较为全面、系统的讨论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

^① 山根幸夫曾提出，明代后期，在统治阶级的绅士之间公然出现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的阶级分化，并且爆发了两者的冲突对立。与农民军积极合作的，其中心是下层绅士，其动机主要是追求经济利益，渴望升官发迹的缘故。参山根幸夫着，冯佐哲译，〈明末农民起义与绅士阶层的反应〉，《晋阳学刊》1986：2，页74—79。在徽州无赖充斥的社会中，下层绅士是否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并进而与流寇有所关联，值得更进一步探讨。另可参考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5）第8章〈生员的无赖化〉，页387-412。

化的原因，并呈现出其背后的问题症结。立论精辟而中肯，使我们能对宋明间的徽州发展演变，有更深入而全面的认识。

收稿日期：2007-12-9

作者简介：魏君州，男，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